

我所认识的洛地先生和他的学术风格

俞为民

—

我认识洛地先生还是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我正师从钱南扬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戏曲史。我在一些学术刊物上看到洛地先生的一些论文后，便被他的敏锐的思辩与新颖的见解深深地吸引了。接着知道他是在浙江省艺术研究所工作的，还与我是老乡，于是在那年（1980）寒假回家时，我就特地寻上门去，向他当面求教。记得当时洛先生还住在杭州鼓楼附近的一栋简易楼房内，全家人挤在一间房子内，十分拥挤，而这也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能享受到的待遇。由于是初次见面，而且当时自己还是作为一个学生的身份来求教，故心里有些惴惴不安。但当我自报家门，说明了来意后，洛地先生十分热情，不仅一一回答了我所提出的问题，而且还就戏曲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临别时，还送给我几篇他刚发表的论文。他的坦诚相待与精辟的见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自此以后，每逢寒暑假，我都要到洛地先生府上拜访讨教，而每次去拜访，每次都有许多收获。近二十年来，无论在学术观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我都得到了洛地先生的帮助与指导。在与洛地先生二十年的交往中，我敬佩他的为人坦诚与热情，敬佩他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

不仅仅是我，我想凡是读过洛地先生的著作和论文的人，都会对他的论文与论著产生一种“怪”的感觉。这种“怪”，并不是贬义的，而是一种耳目一新的“新颖”之感。如他提出：元杂剧并不是兴盛于北方大都（今北京），而是兴盛于南方的杭州。又如前人在解释律句时，皆是自首字向后数，即所谓的“平平起”或“仄仄起”，而洛地先生根据我国古代韵文的句式结构以韵字或句脚为基点这一内在特征，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结论，认为：判断律句，“是从句脚往前推，而不是相反如论家们所说的自首字向后数”（《论“一字领”》）。这些见解“真‘怪’”，即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而且初看题目或文章前面的摘要，足以使人吓大一跳，但读过全文之后，则又觉得合情合理；掩卷而思，便会产生“原来如此”恍然的感觉。这种“怪”，正体现了洛地先生的学术风格，而洛地先生也正是以这一系列带有这种“怪”的是风格的论

著，在名家辈出、巨著如林的学术界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确立了他 在学术界的地位。

从学术研究的物质条件与工作环境来说，洛地先生显然远不如名牌大学或国家级的研究院所，但他却能够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我认为，这主要归功于他那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研究戏曲与研究传统的诗、词、文不尽相同，诗、词、文是案头文学，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史知识与文本史料大致就可以了。戏剧、戏曲则不同，它不仅是一种案头文学，而且更是一种舞台艺术；虽然不接触舞台实际，不懂作曲、唱曲，也能对戏剧的文学剧本及其中的（戏）曲进行研究，但总是有一种“隔”的感觉，对有关戏曲的本体方面的问题看不清楚，有时还会因强作解释，而说出外行话来。反之，若是没有一定文史知识与专业理论，仅有作曲唱曲或演出的实践，也不能将自己在舞台演出或创作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洛地先生一方面由于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了系统国学的教育，诗、词、曲、古文等皆有很高的修养，而且他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精通乐律，因此，具有较扎实的文史功底与专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动荡与生活道路的坎坷，使他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被“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这对于他的生活来说，是遭到了极大的磨难，是很大的不幸，但对于他的学术生涯来说，却是因祸得福，在“沦落”时期，他到了“底层”，他真正地看到民间（他自己就是民间的一分子），与民间戏班的演出、与民间艺术有了深切的广泛的接触，从民间获得了在书斋里得不到的知识与资料。这样也使得他的知识结构更为完美，即既有扎实的文史知识与专业理论，又有丰富的实践。洛地先生常自谦地说，他的研究是属于“江湖派”、“野路子”，若从他的某些研究方法与所采用的一些来自民间的资料来看，确与那些自诩为“学院派”的学者有些不同，但由于他具有扎实的文史知识与专业理论作为基础，因此，能够把“野”的东西经过分析、综合，提升到了理论的层面，而这样的研究，无论是“学院派”，还是“实践派”都是做不到或做不好的。

说洛地先生的学术风格“怪”，除了他的知识结构与众不同外，更重要的是他独特的思维方式。洛地先生的思维方式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不从众，不盲从名家、大家的结论。在他的论著中的论题，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前人早已论及

的，而且是被许多名家、大家都早已作出了结论的，但他能从新的视角，对这些问题重新加以探讨；问题仍是老问题，材料也是老材料，但由于他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从而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就像我们在旅游时来到一间房子前，正遇到“一个人”从里面出来，对正要进去的人们说，里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好看的，于是人们就相信了，不再进去了，有的甚至已经将一只脚跨了进去，听说后也就退缩了出来；后来的人们又听了前面的人的话，也不进去了；这样“第一个人”所说的也就成了结论。而洛地先生不盲从，非要跨进去看个究竟不可；也正因为此，他才能够看到与众不同的东西，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二是能着眼于事物自身运动的逻辑，这是最为重要的。他认为“探索事物，即在于探索事物运动的逻辑；认识事物，即以事物运动的逻辑去审视、去分析事物的演化，去辨认事物的种种现象和形态。”（《洛地文集》卷一《总序》）因此，他在研究中，总是能从事物自身运动的逻辑着眼，通过对事物的纷纭复杂的现象与过程的分析、综合等研究，寻绎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如关于词调的分类问题，前人多以字数的多寡来区分词调的小令、中调、长调等类别，而洛地先生通过对现存的一千多个词调的内在结构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以词调的“韵断”来分类的主张。又如通过对中国民族歌唱的分析考察，将中国的唱分为“以乐传辞”与“以文化乐”两类。这些见解与众论不同，可谓“标新立异”，但由于是根据事物本身的内在特征提出来的，故令人信服。

自从我首次向洛地先生当面求教至今，已有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时间里，洛地先生以他一篇篇、一部部既“怪”又有高品味的学术论文与论著建立他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不仅在词曲研究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而且由于在他所提出的学术观点中，纠正了前人的误导，引起了学术界的反思，为今天以及后来的研究者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故就某些课题的研究来说，洛地先生的学术见解，是开创了新的阶段。

二十年过去了，洛地先生也已进入了古稀之年。可喜的是，他的思维还是那样敏锐，他的学术研究仍然充满着活力。我们期望洛地先生能继续发表新的“怪”论，出版新的论著，这是学术界的幸事，而对于我来说更是幸事，因为

我能继续从洛地先生那里获得新的帮助与指导。（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厦门大学图书馆